

## 《航海者》之后：马林诺夫斯基的田野工作与库拉的后续研究

梁永佳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100083)

**摘要** 《西太平洋的航海者》问世以来，英语人类学界已经做了大量的后续研究。本文在检讨马林诺夫斯基田野工作方法的基础上，将他的田野工作还原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之中，并总结了有关库拉的后续研究。作者提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之后的研究，主要围绕着马林诺夫斯基的田野工作方法和库拉的民族志调查展开的。两者都超越了马林诺夫斯基式的功能主义方法，但《航海者》对于今天人类学的魅力所在，仍在于研究他者，在于超越量化手段，在于满足于“片段”的调查。

**关键词** 《西太平洋的航海者》；田野工作；库拉；礼物

(中图分类号) C9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575 (2015) 01-0027-08

DOI:10.15970/j.cnki.1005-8575.2015.01.005

1922年出版的马林诺夫斯基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主要记述了“库拉”(kula)交换体系。这本著作被誉为人类学田野工作的开始，也标志着功能主义正式登上人类学的舞台。马林诺夫斯基甚至认为，“社会人类学于1914年在特罗布里恩德群岛开始”<sup>[1]</sup>。费孝通先生在“从马老师学习文化论”一文中，也称赞道“他在1922年出版的第一本实地调查报告 *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 使他一举成名，并成了社会人类学新兴一代的代表作”<sup>[2]</sup>。自《航海者》问世以来，尤其是二战以后，围绕《航海者》的研究一直没有中断，有关研究大大丰富了人类学对美拉尼西亚社会的认识，也对人类学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国内近年也对《航海者》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比较集中的研究<sup>①</sup>。但中文文献中，较少有人留意英语人类学界对马林诺夫斯基田野工作的反思和对库拉的后续研究。本文拟对这些研究做一相关探讨，提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的后续研究，主要围绕着马林诺夫斯基的田野工

作方法和库拉的民族志调查展开的。两者都超越了马林诺夫斯基式的功能主义方法，对于中国的人类学研究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 一、《航海者》的基本内容和田野工作方法

《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取名希腊神话中寻找金羊毛的英雄伊阿宋所乘的船只阿尔戈号(Argo)，主要是写巴布亚新几内亚东部群岛上的的一种叫“库拉”(kula)的交换制度。马林诺夫斯基第一次到达那里没几天，就注意到了库拉的存在。他主要田野工作地点称为“特罗布里恩德群岛”(Trobriand Islands)(当地人称之为“基里维纳”[Kiriwina])，位于巴新海岸以东200公里的一个环状群岛西部。群岛上的居民热衷交换两种东西：一种叫 *soulava*，是用红色贝壳打造的项圈；一种叫 *mwali*，是以白色贝壳琢磨的臂镯，它们统称为 *vaygu'a*，即库拉宝物。除了能在少数仪式中佩戴外，它们没有实际用

(收稿日期) 2014—10—09

(作者简介) 梁永佳，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宗教、民族、西南中国。

<sup>①</sup> 如高丙中“民族志的科学范式的奠定及其反思”，《思想战线》2005年第1期；高丙中“民族志发展的三个时代”，《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03期；陈兴贵、李虎“《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对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启示”，《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王昊午“从民族志撰写角度重读《西太平洋的航海者》”，《西北民族研究》2013年第2期；等等。

途。土著人十分看重它们，谁得到的宝物多且名贵，谁的声望就大。很多宝物具有专名，土著人不仅耳熟能详，还能如数家珍般讲它们的故事。

库拉交换的首要规则，是宝物按规定的方向不定期流动。这便在整个环形群岛间形成了一个闭合回路，马林诺夫斯基称其为“库拉圈”（kula ring）。两种宝物各有流向：项圈（*soulava*）按顺时针方向流动；臂镯（*mwali*）按逆时针方向流动。如果你站在库拉圈的任意一点上，面对圆心，那么你的左手永远接到臂镯，传出项圈；右手永远接到项圈，传出臂镯。库拉宝物不能永久占有，只能保留一段时间，最长不过几个月，顶多一年，然后就要在下次交换中送出去，否则别人会责备“太慢”。收到库拉的人会得到荣耀和声望，拿到名器更会令整个社区侧目动心，这有点像在体育比赛中得到奖杯。

库拉交换大多在大型仪式中进行，但要在个人之间结成的“库拉伙伴”中传递。参与库拉的人主要是男子，海外库拉更是只许男子参与，不同村落的参与规模也不尽相同。但参与者“一旦库拉，终身库拉。”地位越高，库拉伙伴也越多，酋长多达几十上百，经他之手传递的宝物也比一般人多，他经常能改变宝物的流通过程，如同扳道工，因此，一般人很少能两次得到同样的宝物。一个人一般是在成年之际，得到父亲或舅舅赠送的宝物，然后他再用这件宝物打入库拉圈，建立自己的伙伴。

项圈和臂镯在互赠的时候，珍贵程度应该相当。这由受礼者决定，方式是回赠一件价值相当的礼物。即使回礼不等值，对方也不能拒绝，但可以抱怨，取得他人的同情。实际上，每次送礼并非像人们熟悉的那样彬彬有礼，而是送礼者站在那里夸耀一番自己的宝物，把库拉抛给对方一脸不屑，让对方的随从去捡。受礼者试图贬低宝物的价值，但却不得不坐在地上低人一头。“给出者地位高”这一普遍现象，在库拉圈也不例外。库拉宝物从来不能马上对换，一赠一回必须隔开一段时间，从几个小时到一年不等。如果手头没有合适的宝物作回礼，你就要在下次库拉交换的场合送一件次等的过渡礼物，等有了合适的宝物再作正式回礼。如果你得到一件贵重的宝物，你的伙伴们也可以送去索要礼，争取你的青睐。索要礼有很多种，都不属于库拉宝物。

库拉宝物有两种交换场合：内陆交换和海外库拉，后者的交易量最大。实际上，库拉并非

“匀速”交换，而是随着一次次海外库拉而做脉冲式流动。海外库拉以“库拉社区”为单位，由临近的岛屿和村落结成，整个库拉圈共有17个库拉社区。同社区的村落订好时间，建造或翻新船只后，一齐开往海外另一个库拉社区。海外库拉的目的是获取库拉宝物，且有竞争意义，所以任何人都不许带宝物，而是要靠巫术获得海外伙伴的青睐。

如此大规模的区域交易制度，完全是为两种“没有用”的装饰品而设。它们维系着土著人的光荣与梦想，消耗着他们的时间和精力，激励着他们的聪明与才智，撩拨着他们的贪欲和野心。马林诺夫斯基发现，这些“勤劳勇敢”的土著人，在从事一种闻所未闻的交换方式。它打破了西方经济学家对原始经济的虚构，它告诉人们，原始人不是唯利是图的小人，也不是非到要交换不可的时候才去交换，更不是只为生活必需品才去交换。马林诺夫斯基预言道，库拉的交换形式还会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发现，就像“马纳”、“图腾”、“塔怖”（Taboo）一样，库拉将成为经典的人类学概念。事实的确如此，《航海者》开启的库拉研究，已经成为人类学中最经典的课题之一。

有关田野研究方法，马林诺夫斯基在《航海者》的导论中提出了著名的“三步策略”：用大纲表格勾画出部落生活的骨架、用不可测量的例证填充部落生活的血肉、收集语言材料和精神生活资料。他认为首先要将部落组织及其文化构成以翔实、明确、具体的大纲记录下来，并简化成图表，这被称为“具体证据统计文献法”，其目的在于尽快找到那些常态的、多发的情况，并总结这些实例，归纳出土著文化和社会的框架。其次，观察在原则、规定之下，人们如何行为，感情如何，某些活动的生命力怎样。例如，在某一公众集会，人们是敷衍塞责、无动于衷，还是积极热情、自觉自愿？这些现象，不能用询问或统计资料的方式记录下来，而只能在具体的状态中观察，马氏称之为“实际生活的不可测度方面”。最后，土著人的观点、意见、说法等心理状态，由于可以左右他们的行为，所以也必须予以观察记录。作为社会学家，不必纠缠于难以捉摸的个人心理，而是努力找出典型化的思想和情感使之与某一给定社区的习俗和文化对应。这需要一字不易地引述关键的陈述，甚至直接用土著语言做笔记，并形成一个土著语料库。

马林诺夫斯基的这些方法，被后世总结为整

体论和主位法。整体论在马氏那里，意味着“对整个部落文化的所有方面都给予研究”<sup>[3]</sup>。对于主位法原则，他也指出，民族志田野工作的最终目标，“是把握土著人的观点、他与生活的关系，搞清他对他的世界的看法。”<sup>[3][25]</sup>

这一套方法，不仅迥异于殖民官、传教士、旅行家的业余记录方式，也不同于里弗斯、哈登、塞利格曼等前辈蜻蜓点水式的材料搜集法，有着开创性意义，为人类学今后的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石。尤其难得的是，他对整体的关注和对土著人视角的强调，到今天仍然有效，反对声音至多只是质疑这个目的是否能达到而已。但以下三个问题却值得进一步推敲：

第一，“三步策略”实际上建立在三个前提之上：土著生活存在均一的原则，土著根据这些原则行为，行为背后是心理反应。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将生活划分为原则、行为、心理的方法过于粗糙，透露着马氏功能主义一系列还原论前提：现象还原为规则，规则还原为心理，心理还原为需要。显然，土著生活的逻辑很容易在这些还原的过程中流失。就连《航海者》本身的丰富程度，也超出了“三步策略”所设定的范围。

第二，用土著语言记录土著人精神的主张，基本是失败的。马氏所追求的，是一份原汁原味的土著语言材料库。然而有兴趣使用这些语言材料的人士，并没有像他预言的那样如期而至。埃文思-普理查德创造性地改造了这一方法，在坚持使用土著语言进行调查的同时，突出了关键词的意义，“每一个有经验的田野工作者都知道，田野工作中最难的是确定一些关键词的意思，整个调查的成功都建立在理解它们的基础上”<sup>[4]</sup>。

第三，马氏的整体论方法，不同于今天我们熟悉的法国传统中的“总体”（totality）概念<sup>①</sup>，而是一种“记录一切”的野心，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日常生活的复杂程度，并不因土著社会“简单”、人口规模小就可以“穷尽调查”（实际上，不少人至今仍然固执地认为，人类学田野工作，就是对一个社区进行“穷尽调查”）。《航海者》篇幅虽大，但也相当不完整，甚至缺乏有关库拉的关键材料，弗雷泽在序言中预告的有关特罗布里恩德土著生活的全面记录，也从未问世。“库拉”是什么意思？他是怎么生产的？巫术是怎么传递的？殖民对库拉有什么影响？这样的问题可

以一直问下去，但我们永远都无法得到一个涉及生活方方面面的“整体”。马氏常被批评“未能展示一个连贯的、提纲挈领式的特罗布里恩德文化”<sup>[5]</sup>，“在同样的法律和经济原则的支配下的那些制度——如婚姻、有关死者的节日、成年礼，等等——还有待详述。”<sup>[6]</sup>正如埃文思-普理查德隐讳的批评所说“在叙说赞德神秘信仰和仪式时，我非要描述赞德人的整个社会生活吗？如果描述与农业和狩猎有关的魔法，我就必须介绍歌舞吗？我想并非如此，世界上任何事物最终都与其他所有事物相联系，如果我们不把现象从中提取出来，对它们的研究就无法开始。”<sup>[7]</sup>

## 二、马林诺夫斯基田野工作的环境

马林诺夫斯基在澳大利亚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活动，人们原本所知不多。弗斯（Raymond Firth）、库伯（Adam Kuper）、艾伦（Roy Ellen）、松顿（Robert Thornton）、斯多金（George Stocking）、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以及马氏的“官方传记人”迈克尔·扬（Michael Young）等都曾致力于马氏田野工作的研究。1967年出版的马林诺夫斯基日记，更大大增加了人们对《航海者》的理解<sup>[8]</sup>。但最重要的研究是2004年问世的，这一年，迈克尔·扬出版了《马林诺夫斯基：一位人类学家的奥德赛，1884-1920》。扬教授遍查澳大利亚、英国、美国、巴新的马林诺夫斯基档案，仔细阅读了马氏本人及其周围人士的通信、笔记等手稿材料，写出了一部长达720页的专著。这本书使我们对《航海者》的研究过程有了全面的认识。我个人认为，这本略显繁琐的“流水账”，已经全面地呈现了《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成书背景。有兴趣深入了解的读者不妨找来一读，此处不做详述，仅略述该书三个有趣的发现。

首先，马林诺夫斯基的田野工作并非那么“偶然”。他固然是第一个进行此类田野工作的人类学者，但说马氏一扫人类学之颓，自己发明了高密度的田野工作方法，则有些言过其实。当时，英国人类学界的有识之士已然认识到，靠殖民官、传教士、旅行家收集田野资料的方法并不可靠，人类学家应该亲自从事长期的、高密度的田野工作，并用当地语言针对一个小群体进行全方位的

<sup>①</sup> 如，布迪厄这样评价法国学术传统中的“总体”：“观察和理解人类实践所展示的一切，只能通过他们的相互关系，这就是‘总体’（totality）”，见 Pierre Bourdieu, *Distinction*, London: Routledge, 2010 [1984], p. xvi.

研究。与人类学名宿不同，马林诺夫斯基年轻气盛，有大把的时间。况且，他在伦敦已经崭露头角，曾当面批评过弗雷泽、里弗斯（W. H. R. Rivers）等大人物，也撰文批评过涂尔干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他对盛极一时的进化论不以为然，认为遗留物之说站不住脚。在塞利格曼、哈登（Alfred Haddon）和马雷特（R. R. Marret）的共同努力下，马林诺夫斯基总共得到了大约450英镑的经费，专门用于巴布亚新几内亚从事田野工作。塞利格曼1913年在致哈登的信说，“我觉得这[450英镑]应该差不多够他[马林诺夫斯基]两年的田野开销了。他告诉我如果我能筹到钱的话他准备在田野待这么长的时间”<sup>[9]</sup>。可见，马氏的田野工作恰逢其时，是一个“正确的人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点”<sup>[5][7]</sup>。

其次，马林诺夫斯基虽然是奥属波兰人，是大英帝国在一战中的敌国公民，但他并未像普遍认为的那样，受到澳大利亚政府的严厉管制，“流放”般地被赶到巴布亚新几内亚从事孤独的田野调查。恰恰相反，他在澳国和巴新并未遭遇真正麻烦，也没有与世隔绝。他登陆澳大利亚的身份，是不列颠科学促进会（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人类学分会的秘书，目的是出席在澳大利亚召开的第84届年会。同行的有近百位英国重量级科学家，其中包括里弗斯、哈登、史密斯（Elliot Smith）等人类学家，以及后来与马氏齐名的拉德克里夫-布朗（Alfred Radcliffe-Brown）。虽然他们登陆不久，就传来了英国加入一战的消息，但是马氏手握伦敦经济学院院长的推荐信，身边有哈登等人的支持，嘴里挂着大英帝国的殖民利益，因此田野工作一路绿灯。上岸没两个月（1914年9月12日），他就到了巴新首府莫尔兹比港，并受到热情接待，而这里正是塞利格曼和他计划的目的地。

第三，马林诺夫斯基的田野工作，并非像他自己在著作里说的那样“高密度”。从1914年7月28日登陆澳大利亚到1919年2月25日离开的四年半里，他大部分时间是在澳大利亚本土度过的，田野工作总共加起来不到19个月，分为三次：第一次在莫尔兹比港附近的迈鲁（Mailu）岛，从1914年12月开始，到次年2月结束；第二次在特罗布里恩德，从1915年6月27日持续到当年12月，这次田野工作几乎没有留下什么记录；第三次仍然是在特罗布里恩德及其周围，从1917年12月一直到1918年9月。他先后在

特岛的时间总共有16个月，他是特岛殖民官、传教士、商人的常客，也很自然地卷入当地的政治纷争和感情纠葛。而且，他与远在欧洲战争中的母亲、导师塞利格曼等“文明世界”中的人士一直保持通信，甚至与澳大利亚本土的两位大家闺秀谈了一场三角恋，并且最终娶了其中一位做太太。

传奇往往经不起推敲，迈克尔·扬用“奥德赛”反讽般地解构了一个人类学神话。在《严格意义上的日记》中，马氏经常透露出他对土著“与日俱增的厌恶”，抱怨“基里维纳村庄十足的乏味”<sup>[10]</sup>。但这一切都不能抹杀马林诺夫斯基的不世贡献。他或许不是一个百分之百诚实的人类学家，却是第一个用土著语言从事田野工作的人类学家。他超凡的语言能力、观察能力和表述能力，淋漓尽致地反映在《西太平洋航海者》中。这本书也为整个人类学界树立了一个至今未被取代的范式。自他开始，高密度田野工作也成为人类学者的不二法门。就连与他分道扬镳的埃文思-普里查德（E. E. Evans-Pritchard），也赞扬道“可以公正地说，现代人类学的全面的田野工作直接或间接地来自他的教导”<sup>[4][53]</sup>。

在《航海者》中，马林诺夫斯基称田野工作是一种叫“民族志”（ethnography）的“科学方法”，其中一个要领就是长期地与土著生活在一起。他认为研究者需要交代观察的条件和情境，经历长年累月的辛劳，把亲身观察和土著陈述的原始材料整理成一本有条理的记述。研究者需要克服与土著人接触的艰苦、语言的障碍、身心承受的巨大压力等种种困难，认为这需要三个条件：“首先，学者理所当然必须怀有科学的目标，明了现代民族志的价值与准则；其次，他应该自己具备良好的工作条件，主要是指完全生活在土著人当中而无须白种人介入；最后，他得使用一些特殊方法来搜集、处理和核实他的证据”<sup>[11]</sup>。马林诺斯基尤其强调不能待在白人的住处，定期冒出来“做”土著人，否则土著人无法在民族志学者面前行为如常，民族志学者也会遗漏很多有意义的事件和细节。但根据扬的研究，马氏自己并没有完全做到这些要求。

扬认为，马林诺夫斯基的田野工作时长，比《航海者》英文版第16页提供的田野工作时间要短得多。在迈鲁田野工作中，马氏经常穿梭于莫尔兹比港和小岛之间，扬说：

他习惯性地夸大了自己在田野里停留的时

长，称“在12月、1月、2月的大部分时间里，除了两三天，自己都独自和土著人待在一起”，这显然不是事实（他的日记提供了最好的证据）。实际上，他在迈鲁度过的七十多天时间里，只有一半时间可被看成未受到其他欧洲人进行的生活交往的影响，而且即便他希望如此，他也无法完全躲过他们的影响。<sup>[12]</sup>

马林诺夫斯基曾宣称，自己在特罗布里恩德（即“基里维纳”）的田野工作，“仅仅只在满打满算不超过六个星期的短暂期间内，我享受了我在古萨维塔的朋友汉考克及在西纳克塔的布鲁多夫妇的热情款待。其余时间我都是支开帐篷，生活在土著中”<sup>[13]</sup>。但扬替他算了一笔账：

因为缺乏日记记录，无从核实其1915—1916年的田野之旅，但是根据他1917—1918年的日记，他在古萨维塔和汉考克一起过了8个星期，在西纳克塔和布鲁多夫妇过了3个星期。另外5个星期是在西纳克塔的汉考克的一间老屋舍度过的，那里离布鲁多夫妇家只有一小段距离，他会在晚上和他们一起吃晚饭。他在基里比过的几夜加起来又是一个星期。鉴于这些数字，我们可以宽厚地猜想马林诺夫斯基声称的“满打满算不过六个星期”中的“六”其实是“十六”的误拼。可以计算出来的是他在“土著人中间”住帐篷的时间不过是二十二星期，而他在1917年12月至1918年9月在这些岛上居住的总时间是四十一个星期。换句话说，他在基尼维纳期间有近一半时间帐篷是收起来的。<sup>[12] (531)</sup>

考虑到迈鲁田野工作的挫折和第一次特岛之行的有限成果，马氏田野工作的主要部分当数第二次特岛之行。而这次田野工作却只有二十二个星期可能是在马氏设定的理想状态下进行的，因此他的田野工作并非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惊世骇俗。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马氏能在这个样的工作密度下收集那样丰富的材料，并写出一系列民族志经典，足见其惊世骇俗的田野工作才干。正如库拉船队像希腊神话的阿尔戈英雄一样，马林诺夫斯基也不愧人类学界的英雄奥德修斯。

### 三、库拉的后续探讨

《航海者》发表后不久，就受到同时代人类

学家的高度重视，并与拉德克里夫—布朗的《安达曼岛人》一道，开创了高密度田野工作的传统，马氏与布朗两个人也培养了一整代田野工作能人，如弗斯、埃文思—普里查德、福忒斯（Meyer Fortes）、格拉克曼（Max Gluckman）、利奇（Edmund Leach），以及费孝通、许烺光、田汝康等。不过，真正将《航海者》纳入人类学理论脉络的，是比马林诺夫斯基大一轮的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在他的经典著作《礼物》中，莫斯将库拉纳入更大的视野，指出它并没有像马氏所说的那样独特，而是与美拉尼西亚其他地方的交换体系十分类似，甚至与西方现代人的权利原则也没有什么差别。通过对库拉涉及的各项礼物（开礼、回礼、咬定礼、刺破表皮的礼）关系的分析，莫斯精确地指出马林诺夫斯基没有意识到的问题“就其本质形式来说，库拉只不过是特罗布里恩的庞大的、涵盖了该岛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全部的呈献与回献体系中最庄严的一环。库拉似乎是这种生活的高潮，其中又以族际库拉和部落间库拉最为突出。”<sup>[4] (52-53)</sup> 在莫斯看来，库拉是一种“竞争性的总体呈献体系”，是互惠<sup>①</sup>关系的一种。它仍然无外乎礼物极为普遍的原则：赠礼义务、受礼义务、回礼义务。

后续研究补充了《航海者》的不足，也纠正一些错误，证明并丰富了莫斯的推测<sup>②</sup>。例如，《航海者》认为，存在丈夫对妻子以及父亲对儿子的、不求回报的“白送礼”（free gift）。道格拉斯（Mary Douglas）指出，世界上没有“白送礼”这回事，马林诺夫斯基错误地按个人动机区分礼物种类，却没有意识到，丈夫给妻子的礼物是对于妻子性服务的回报。<sup>[14]</sup> 维纳（Annette Weiner）的再研究则告诉我们，父亲对儿子的礼物绝非白送，而是获取名声。<sup>[15]</sup> 维纳还从性别角度指出，马氏所说特岛男人将自己辛苦耕种的甘薯送给姐（妹）夫，并非仅仅出于慷慨，而是履行义务。在这样一个母系从夫居的社会里，女性婚后仍由兄弟抚养，得到妻兄（弟）甘薯的丈夫也因此欠了妻子的人情。回报

<sup>①</sup> “互惠”为 reciprocity 的通用译法。但莫斯使用的 reciprocity，也可以指竞争，甚至不乏暴力和对抗，因此更合适的译法应为“互往”。笔者感谢朱晓阳教授在这个问题上对我的启发。

<sup>②</sup> 由于《航海者》的贡献，使美拉尼西亚成为人类学调查最为频繁、多产、深入的区域。步马氏后尘的人类学家，写作了高水平的民族志作品，如 Reo Fortune, *Sorcerers of Dobu*,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32; J. P. Singh Uberoi, *Politics of the Kula Ring*,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62; Jerry Leach & Edmund Leach (eds.) *The Kula: New Perspectives on Massim Ex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等。

的方式在于妻方亲属身故之时，丈夫的姐妹列队送来香蕉叶和裙子。在亲属关系上，这一列队与送来甘薯的列队方向正好相反。用言语和列队展示的方式夸大礼物、用巫术降低获赠者的胃口、用巫术祈美，都是为了在交换中占得优势，获得荣誉、声望、权力<sup>[15]</sup> (195-201)。维纳还指出，库拉的互惠原理与甘薯换蕉叶的原理一样，同样要求臂镯和项圈之间的“等价”，同样要夸大礼物、列队展示、用巫术索取。为其不同，在于库拉让男子暂时将自己的农园、妻儿、姐妹搁置一边，专心与其他男人争夺荣誉和声望。但正如甘薯与蕉叶之间要斤斤计较一样，那些看似以等价为原则的臂镯和项圈的交换，其最终目的乃是获得“利润”。敢于用大礼回小礼的人，会改变交换链的平衡，自己获益的同时，使遥远的某个人受害。但一个人由于高度依赖他的库拉伙伴，他必须有足够的力量才敢于改动这场“零和博弈”。因此，库拉如同银行户头，善于交易的人能提高他在地方社会中的信誉<sup>[16]</sup>。

不少《航海者》的后续研究都在库拉圈内外发现了美拉尼西亚交换体系的竞争性质。例如，曼恩 (Nancy Munn) 从马克思主义角度提出，库拉交换的真正含义是声望的生产<sup>[17]</sup>。斯特拉森 (Andrew Strathern) 则发现，巴新主岛上哈根人的“摩卡” (moka) 交换，目的在于“大人物”积累声望和财富<sup>[18]</sup>。哥德利埃 (Maurice Godelier) 总结了截止到 1996 年有关库拉的重要研究，认为后人有三个重要发现：只有特岛的库拉不能进入其他领域；库拉宝物是由一种称为 *kitoum* 的人造物转变而成的；转为库拉的 *kitoum* 形成一个“库拉路径” (*keda*)，在交换路径首尾衔接之前，库拉不能以其他非库拉宝物取代。由此，哥德利埃借用维纳的“不可让渡的所有物” (inalienable possession) 概念<sup>[19]</sup>，发展了莫斯的礼物理论，提出了社会构成必须建立在“交换”与“不可交换”两种属性上，后者往往是神圣的、不可让渡的<sup>[20]</sup>。可见，莫斯在 1924 年《礼物》一书的三个判断基本正确：库拉是特岛全部呈献和回献体系的一部分，库拉是美拉尼西亚各种交换体系中的一种，库拉是一个为声望和名誉竞争的体系。正是莫斯，将《航海者》纳入了跨时空的比较视野。

戴木德 (Frederick Damon) 对库拉的研究，从莫斯的交换理论转向了马克思的生产理论。受到格里高利 (Christopher Gregory) 的启发<sup>[21]</sup>，戴木德提出，库拉看上去像列维-斯特劳斯的“广义交换”，实际则有赖于库拉宝物和社会关系的生产过程<sup>[22]</sup>。理论上，库拉圈上的所有人都可以参与库拉交换，但实际上只有少数人有能力参加，整个库拉圈里的库拉宝物也不过一千个左右，因此这是一个高度竞争的制度。所有库拉宝物都由 *kitoum* 转换而成，它以一件项圈 (*mval*, 《航海者》拼写为 *mvali*) 或臂镯 (*bagi*, 即《航海者》的 *soulava*) 的形式进入库拉圈。但第一个将 *kitoum* 作为宝物送给库拉伙伴的人，并没有失去他对 *kitoum* 的所有权，其他库拉伙伴也因为不拥有库拉宝物的 *kitoum* 而必须将它送出去。但正因如此，送出库拉的人会增加他的“名声” (fame)。库拉交换之所以在理论上等价，就在于送出臂镯的人和送出项圈的人所拥有的 *kitoum* 等价。这里的“价”由两个因素决定：宝物本身的大小和传播的远近。戴木德指出，*kitoum* 既属于马克思所说的“生产”问题，即生产宝物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体现为宝物大小)，也属于马克思所说的“转换”问题，即 *kitoum* 在流通过程中能使臂镯和项圈交换，完成社会关系的转换。<sup>①</sup>

近年，戴木德又在斯特拉森 (Marilyn Strathern) 和瓦格纳 (Roy Wagner) 的启发下，将混沌理论纳入库拉研究，提出库拉体系可能与整个印度洋-太平洋地带的区域互动有关。考古发现说明库拉体系是在类似复活节岛巨石建筑之后的 1300-1400 年间出现的，与此同时，巴厘岛出现了“尼加拉” (*negara*)，东南亚大陆出现了“曼荼罗” (*mandala*)，三者都是围绕“名望”而运转的体制，这可能与当时印度和中国在上述区域的不同影响有关<sup>[23]</sup>。根据混沌理论，库拉的形成很可能是由原初的一个小的、被称为“奇异因子”的细微改变导致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变通做法不断自我复制，每次复制又不完全同于前例，长此以往，逐渐形成一个不同于先前的稳定体系<sup>[24]</sup>。更有意义的问题在于大范围、长距离、长时段的重大转换。最近，在笔者

<sup>①</sup> Frederick Damon, "Kula Valuables: The Problem of Value and the Production of Names", *L'Homme* 162 (2002): 107-136. 有意思的是，戴木德只字未提另一个可能与这个命题十分相关的概念，即 *kitoum* 对于探讨“礼物之灵”的意义。正是 *kitoum*，使库拉必须回到“老家”。有关“礼物之灵”的讨论，见莫斯《礼物》，第 18-22 页；萨林斯《石器时代经济学》，张经纬、郑少雄、张帆译（北京：三联书店，2009 年），第 171-213 页。

主编的一期专刊上，戴木德以“劳动过程”为线索，将库拉交换中的独木舟生产技术与中国东南的冶金技术联系起来，让这两个在人类学意义上看似不相关的体系，发生了富有启发的关联<sup>[25]</sup>。如果中国沿海真的在这个意义上与遥远的特罗布里恩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航海者》与中国就多了一层关联。这显然对理解“文明”、“帝国”等人类学研究的某些新问题，有十分重要的启示。

#### 四、余论

马林诺夫斯基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标志着人类学功能主义的诞生。这一范式如此新颖，以至于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人类学分馆馆长威斯勒（Clark Wissler）收到马氏的出版申请信时，竟然婉拒了这份送上门来的大礼<sup>[12] (603)</sup>。可见，新范式的确立，既离不开“时势”，也离不开马林诺夫斯基这样的“英雄”。若不是马林诺夫斯基的执著、个人魅力和灵光一现的“狡黠”——这些同样都是奥德修斯的品格——人类学的今天必然会是另一般光景。

今年距离马林诺夫斯基开始田野工作已经整整一百年，《航海者》问世至今，人类学固然经历了多重变化，但笔者认为，《航海者》当时的魅力在今天仍然有效。

首先，与《航海者》相同，人类学的魅力在于走出自己理解他者。有关“自我”和“他者”、“异文化”和“本文化”的论述很多。但从《航海者》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看到，研

究异文化还有一个研究自己社会所不具备的优势——比较，用自己的知识认识异己的社会时所自然发生的比较。

其次，与《航海者》相同，人类学的魅力在于超越量化手段。多数社会科学都把田野工作理解成“定性研究”，目的是为定量研究做准备或者做辅助。但从《航海者》开始，有经验的民族志学者很容易明白，高密度田野工作所收集的材料属于更深层次的事实，根本不是量化手段可以捕捉的。对于量化问题，卡马洛夫曾一语双关地调侃道“人类学家不算数（count），但是我们爱说我们知道什么算——却极少可以用数字衡量。对我们很多人来说，数字是一种拜物教。”<sup>[26]</sup>

第三，与《航海者》相同，人类学的魅力在于有意停留在“片段”之上。人类学与众多社会科学的区别，在于它满足于对具体社会过程的观察，但却被很多学科视为研究“片段”、“局部”，而不是整体。岂不知，指责田野工作只研究了“局部”，就等于设定了某个“整体”。而这种“整体”，往往只是“国家”、“市场”、“族群”、“帝国”、“宗教”等一系列多次还原后的抽象事物。与“量化”问题相关，人类学者不应该执著于“代表性”这种从“宏观”出发的问题，而应满足于丰富而有关联的“片段”，积极地去比较这些“片段”，这正是莫斯所说“总体社会事实”的含义。从《航海者》出发，人类学仍需要将每个片段视为整体，将每段生活视为中心，将每种“地方知识”视为普遍知识。

#### （参考文献）

- (1) Edmund Leach, "The Epistemological Background to Malinowski's Empiricism", in Raymond Firth edited, *Man and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Kegan Paul, 1957, p124.
- (2) 费孝通. 从马林诺斯基老师学习文化论 [C]. 从实求知录.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309.
- (3) Malinowski, *Argonauts*, p11.
- (4) 爱德华·埃文思-普里查德 (冷凤彩译). 论社会人类学,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0, 57.
- (5) Michael Young, *The Ethnography of Malinowski: The Trobriand Islands 1915 - 1918* [M]. London: Routledge&Kegan Paul, 1979, p2.
- (6) 马塞尔·莫斯. 礼物 [M]. 汲喆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43.
- (7) E. E. 埃文思-普里查德. 阿赞的人的巫术、神谕和魔法 [M]. 覃俐俐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6, 18.
- (8) Bronislaw Malinowski. *A Diary in the Strict Sense of the Term* [M]. London: Routledge, 1967.
- (9) 迈克尔·扬 (Michael Young). 马林诺夫斯基: 一位人类学家的奥德赛, 1884 - 1920 [M]. 宋奕、宋红娟、迟帅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276.
- (10) Malinowski, *Diary*, p163.
- (11) Bronislaw Malinowski, *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 Prospect Heights [M]. Illinois: Waveland Press, Inc. 1984 [1922], p6.

- (12) 扬·奥德赛 [M]. 402.
- (13) Bronislaw Malinowski, *Coral Gardens and Their Magic*, Vol. 1 [M]. London: Alien & Unwin, 1935, p453.
- (14) Mary Douglas, Foreword: No Free Gifts, in Marcel Mauss, *The Gift*, translated by W. D. Halls [M]. New York: W. W. Norton, 1990, p. viii.
- (15) Annette Weiner, *Women of Value, Men of Renown* [M].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76, pp137 – 167.
- (16) Annette Weiner, *The Trobrianders of Papua New Guinea* [M]. Fort Worth: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College Publishers, 1988, pp155 – 157.
- (17) Nancy Munn, *The Fame of Gawa*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 (18) Andrew Strathern, *The Rope of the Moka*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 (19) Annette Weiner, *Inalienable Possessions: The Paradox of Keeping-While-Giving* [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2.
- (20) Maurice Godelier, *The Enigma of Gift* [M]. translated by Nora Scot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1996], pp78 – 95. 中文版见莫里斯·古德利尔. 礼物之谜 [M]. 王毅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 (21) Christopher Gregory, *Gifts and Commodities* [M]. London: Academic Press. 中文版见格雷戈里. 礼物与商品 [M]. 杜杉杉, 姚继德, 郭锐译,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1.
- (22) Frederick Damon, *From Muyuw to the Trobriands: Transformations Along the Northern Side of the Kula Ring* [M]. Tucson: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90.
- (23) Frederick Damon, From Regional Relations to Ethnic Groups?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Value Relations to Property Claims in the Kula Ring of Papua New Guinea [J]. *The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1 (2000) ,2: 49 – 72.
- (24) Frederick Damon, ‘Pity’ and ‘Ecstasy’: The Problem of Order and Differentiated Difference across Kula Societies, in Mark Mosko & Frederick Damon (Eds.), *On the Order of Chaos: Social Anthropology and the Science of Chaos*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pp79 – 107.
- (25) Frederick Damon, ‘Labour Processes’ Across the Indo – Pacific: Toward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Civilisational Necessities [J]. *The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13 (2012) 2: 170 – 198.
- (26) John Comaroff. The End of Anthropology, Again: On the Future of an In/Discipline [J].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12 (2010) 4: 524 – 538.

## **After *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 Malinowski's Filed Work and the Follow-up Studies on Kula**

**LIANG Yong-jia**

(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 Beijing 100083)

**[Abstract]** After *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 was published, a lot of follow-up studies have been made in the field of anthropology in Britain. This paper,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field work method of Malinowski, studies his field work in specific historical situation, and summarizes the follow-up studies on Kula. The writer points out that the follow-up studies are mainly focused on his field work methods and ethnography of Kula. They have surpassed the functionalist approach of Malinowski. While the charm of *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 for today's anthropology lies in its study on the other beyond quantitative method and lies in its contentment in investigating “fragments”.

**[Key words]** *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 field work; Kula; gift

(责任编辑 红梅)